



邓稼先 《黄群恩月》

丹心耀国 矢志不移——追溯邓稼先的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

1924年的6月25日，怀宁县五横邓家大屋铁砚山房（今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里，人们又一次以喜庆地忙碌迎接着一个新生命的到来。那时，沉浸在喜悦之中的人们大抵上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婴儿的诞生，让这座古朴的老宅，在若干年后又多了一个响亮的称号——邓稼先故居。

有人说，邓稼先虽然出生在安庆，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非常有限，8个月大就随家人离乡北上的他，对家乡的灵山秀水应该毫无记忆，或许只有填写表格中的籍贯一栏时他才会想到“安徽怀宁”四个字。其实不然，安庆不仅是孕育邓稼先生命的土地，还是孕育邓稼先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的土地。

优秀品格、与白麟暇邓氏家族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理，我们可以知道，邓稼先的优秀品格，与白麟暇邓氏家族的家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白麟暇邓氏家族有着怎样的家风呢？家族中又有哪些优秀的传承者呢？答案，依然在邓稼先的家乡可以找到。

邓石如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

无论是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是在省内的安徽博物院、安庆博物馆，邓石如的作品都被视为珍宝。然而，邓石如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珍宝”，远不止于此。

邓石如，邓稼先六世祖，1743年出生于白麟暇邓家大屋。他本名琰，石如是字。这种世人多称呼一个人的“字”，而不熟悉其“名”的现象，被称为“以字行”，“以字行”非常普遍，如张仲景、房玄龄、薛仁贵、刘伯温、纪晓岚等，其产生的原因也多种多样，邓石如则是因为要避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的讳。此外，邓石如还有很多其他称呼，包括后更字“顽伯”，以及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等。当然，最常见的还是邓石如。

自刻印“其人瘦而傲”。毫无疑问，邓石如的性格和爱好受到了家风的影响。

对于家风，邓石如不仅有继承，还有发扬。无论是对艺术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还是对名利一以贯之的淡泊态度，他都发挥到了一定的高度。是的，淡泊不等于“躺平”，如果邓石如仅仅将写字篆刻视为谋生的手艺，没有把工作干成事业的决心，没有“每日味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的努力，又怎会成为“千年一人”“一代宗师”？

淡泊如完白山人，或许并不在乎两百多年后的人们献上“千年一人”“一代宗师”之类的赞誉。但是，他大概率会在乎知己好友如何看待他。

曾任浙江知县的云南人师范，就是邓石如的知己好友。师范在自己的作品中称，“石如”二字来自邓石如想要表达的“不低头、不阿谀逢迎，如砥石，一生不染”的人生态度。

师范的看法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他欣赏邓石如的作品，更清楚邓石如的人品。和杨振宁一样，师范也曾写下文字推诚不饰地褒扬挚友邓石如。可以确定的是，邓石如去世时能留给只有10岁的独子邓传密留下的，金银细软、房屋田地必然不多，真迹墨宝、艺术杰作必然不少。不过，他留下最大一笔遗产，还是精神财富——他曾从家风中继承的力量，加倍赋能后传给了后代。

正如画中，邓石如的确于1796年养过一对仙鹤，能鹤于1801年为人所毙，经历过丧妻之痛的邓石如不忍心看雄鹤孤鸣，将其寄养在集贤律院（原为安庆集贤关附近的一座佛庙）。1803年春，安庆知府樊晋强笼鹤而去。邓石如愤书千言长文以讨之，这便是著名的《陈寄鹤书》。归来的雄鹤仍被寄养在集贤律院，1805年农历四月于山中竹林与巨蛇相斗而亡。同年农历十月，63岁的邓石如因病卒于家中。师范闻之悲吟：“山人随鹤化，齐向白云乡。”

不过，襟怀如雪竹，视富贵如云、信富不如贫、知安自宜乐的“清凉散”，能富到哪里去？更何况邓石如还是一位乐善好施、喜欢旅游的人。可以确定的是，邓石如去世时能留给只有10岁的独子邓传密留下的，金银细软、房屋田地必然不多，真迹墨宝、艺术杰作必然不少。不过，他留下最大一笔遗产，还是精神财富——他曾从家风中继承的力量，加倍赋能后传给了后代。

铁砚山房曾吹过什么样的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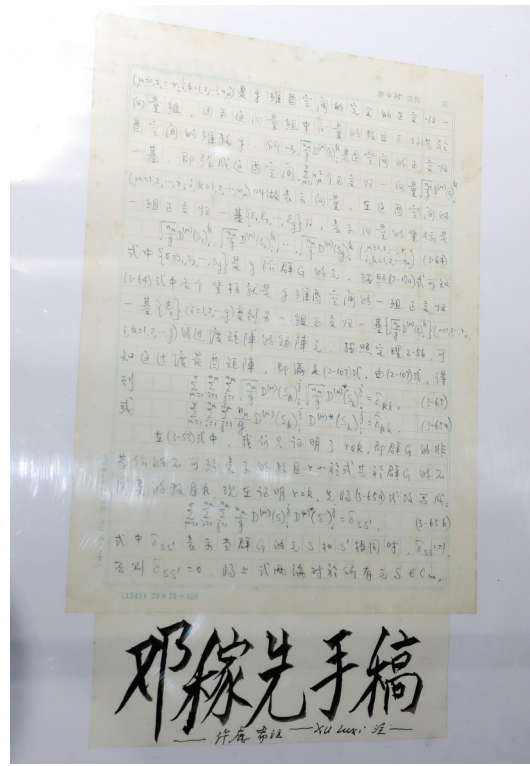
邓传密，字守之，邓稼先五世祖，1795年出生，书法家。邓传密毕生极力搜集邓家旧遗墨、金石，并



铁砚山房。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铁砚山房内景。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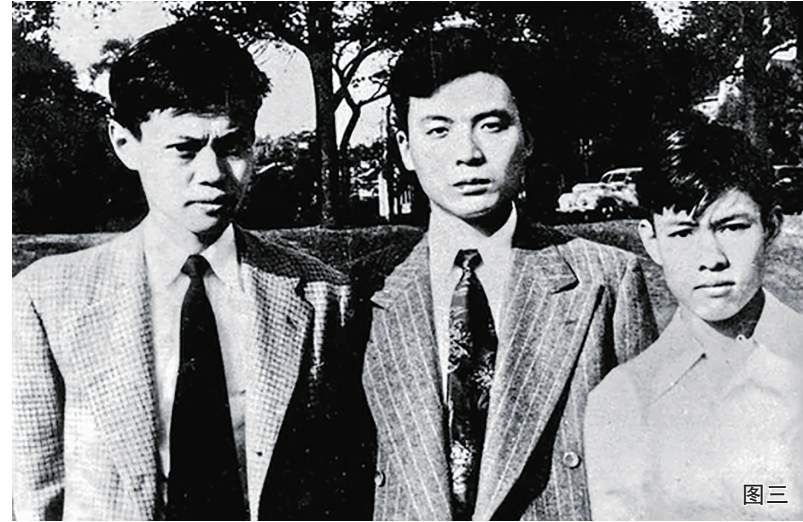


铁砚山房内展示的邓稼先手稿。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邓稼先精神品质的源头在哪里？

无论是怀宁县邓稼先先生陈列展，还是宜秀区邓稼先故居，都能从展示的文物和资料中看到一个信息：邓稼先与杨振宁有着深厚的友谊。

作为与邓稼先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的著



图一：铁砚山房内的邓稼先铜像。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图二：邓稼先先生陈列展。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图三：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资料图片）
图四：怀宁县稼先小学。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图四

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于199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邓稼先》的文章。这篇一位科学家为另一位科学家写作的评传，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2016年，此文还被编入部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课本全文收录，堪称经典。

文中有一章节“邓稼先与奥本海默”，杨振宁专门回忆了自己与两人的交往经历，并对比了两位在各自的国家原子弹研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功臣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奥本海默善于辞令，锋芒毕露，“佩服他的人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邓稼先忠厚平实、真诚坦白，“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对“最敬爱的挚友”，杨振宁推诚不饰地评价道：“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最

三个大村庄：邓家大屋、邓家老屋、邓家燕屋。”“山人因受毕秋帆赠四铁砚，故以铁砚山房作斋名。山人的祖父对明史深有研究，酷爱书法、精于绘画，山人的父亲也擅长诗词书画，并喜爱刻石。山人的四世孙——我的祖父、名艺孙、字绳侯，一生从事教育，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

“白麟坂”在如今通常被写作白麟暇。在现存邓石如的真迹中，有一方印“凤桥麟暇旧茅庐”，证明“白麟坂”的写法也存在已久。

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虽然在白麟暇生活的时间少之又少，但邓稼先对于家乡和家族的历史了解颇多。

在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邓稼先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篇幅追忆先祖呢？显然，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的

试想一下，在“官本位”思想十分严重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一生都没有取得功名的布衣，要在文化社会上取得多么卓越的成就，才会让那些高高在上惯了“官老爷”将其奉为开宗立派的大师？

不仅如此路漫漫，邓石如还输在了起跑线上。邓氏祖上明初迁居白麟暇，世以耕读为业，至邓石如已十三代。虽然祖上也富有过，但到他这一代经济条件并不算好。确切地说，是祖上三代都称不上富裕。

邓石如9岁随父亲仅读过一年书之后便辍学在家，14岁就要“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乞转鬻”赚钱养家。

好在，物质并不富裕的邓石如，收获了不菲的精神财富：祖父邓士沅，酷爱明史和书画，以隐逸为乐事；父亲邓一枝，“博学多通，工四体书，善篆印”，

然出现的人物——桐城人姚鼐，也常向好友邓石如赠诗上诗文，或表达支持，或表达赞赏，有一副对联流传最广：“茅屋八九间，约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可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邓石如，邓稼先文章里提到的毕秋帆，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喜金书、善诗文、研经学。毕沅在湖广总督任上，府中聘僱名士云集，鲜衣怒马，一身布衣的邓石如在其中堪称“异类”。对此，毕沅赞曰：“山人吾辈得一清凉散也。”当邓石如辞职时，毕沅挽留不成，只能送上铁砚和一大笔钱表达敬重之情。

回乡后的邓石如用这笔钱买田建房，这才有了铁砚山房。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的《完白山人放鹤图》，立于松石间的邓石如荷笠持竿泰然而立，一仙鹤环之而自在翱翔……描绘的就是邓石如的晚年生活。

以唐人双钩之法摹之，篆、隶有隶法，学问精湛。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称赞邓传密的书法：“上客有邓子，法绍斯冰严。”“斯”指小篆的整理人、篆书大家李斯；“冰”则是唐代篆书家李阳冰；“严”就是邓传密的父亲邓石如了，因为古人称做过人父者为“令严”。

邓传密和父亲一样没有做过人父，一样也给总督级别的官员做过幕僚，这个总督名叫曾国藩。邓传密及其子邓解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此期间，邓解先于邓传密去世，留下三个子邓艺孙。

邓艺孙，字绳侯，邓稼先祖父，1857年出生，教育家。邓艺孙幼承家学，诗文书法皆清迥脱俗。

关于邓艺孙的为人，同为教育家的李光炯是这样评价的：“公性亢直，不丝毫曲徇人，激进扬清，直道正行，急公益，不纤毫内顾私家，遇公事所在，及

朋友急难，常倾家以赴之，而自持极刻苦。”

幼年丧父的邓艺孙，小时候跟着爷爷邓传密学习，他还曾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本里。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除夕的日记中提到：“午刻，邓守之来，携一幼孙，仅八九岁，盖完白先生之子孙仅存此耳，相对凄然。”

见过1863年的曾国藩，倒不是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但是，这意味着邓艺孙有机会见到华芳、徐寿、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李善兰、吴嘉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科技人才，意味着他有机会见证洋务运动“自强”“求富”口号落地成为实践的第一步，意味着他有机会目睹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厂、中国第一个实用蒸汽机、中国第一架电动机等等在安庆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无可取代地位的城市从无到有！

有过如此见识，天资聪颖的邓艺孙又怎会意识不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因此，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在寻求救国图强的途径时，他毅然选择了教育之路。邓艺孙一生参与创办的学校难以完全统计，比如陈延年烈士的母校同志学堂和全院中学。

陈延年在这些学校读书，当然是陈独秀的选择。事实上，邓艺孙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邓艺孙的女婿葛温中，次子邓仲纯，三子邓以璽曾与陈独秀同在日本留学。邓艺孙的四子邓季宜则曾与陈延年、陈承年同在法国留学。邓艺孙与陈独秀年龄相差24岁，能成为忘年交，除了同为书香门第，又是同乡、亲戚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性格相近。

1905年，邓艺孙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共事。安徽公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呢？看看教员就知道了：除了陈独秀，还有黄兴、赵声、刘师培、柏文蔚、孙毓筠、苏曼殊、陶成章、谢无量等。可以说，就差将“革命党”三个大字写在学校大门上了。虽说当时大清快亡了，但还没死透呢，怎么会不管？事实上，作为学校校董的邓艺孙，利用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积累的名望，在保护学校师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该校创始人李兆熙也说“赖公维护保全”。

类似的保护，也出现在安庆。离开安徽公学后，邓艺孙曾在安庆担任安徽初级师范学堂斋务长兼经学教员。由于该校斋监夏君曾徐锡麟烈士是同乡，引起巡抚李家宝的怀疑，对学校虎视眈眈，邓艺孙又出来奔走疏解，使学校转危为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安徽省城无主，士民惊惶。邓艺孙为维持时局，倡议请孙毓筠回皖任督军，并亲往迎接。事定，邓艺孙被推任教育司司长。

朋友急难，常倾家以赴之，而自持极刻苦。”

幼年丧父的邓艺孙，小时候跟着爷爷邓传密学习，他还曾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本里。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除夕的日记中提到：“午刻，邓守之来，携一幼孙，仅八九岁，盖完白先生之子孙仅存此耳，相对凄然。”

见过1863年的曾国藩，倒不是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但是，这意味着邓艺孙有机会见到华芳、徐寿、龚芸棠、徐建寅、张斯桂、李善兰、吴嘉廉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科技人才，意味着他有机会见证洋务运动“自强”“求富”口号落地成为实践的第一步，意味着他有机会目睹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厂、中国第一个实用蒸汽机、中国第一架电动机等等在安庆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无可取代地位的城市从无到有！

有过如此见识，天资聪颖的邓艺孙又怎会意识不到科教兴国的重要性？因此，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在寻求救国图强的途径时，他毅然选择了教育之路。邓艺孙一生参与创办的学校难以完全统计，比如陈延年烈士的母校同志学堂和全院中学。

陈延年在这些学校读书，当然是陈独秀的选择。事实上，邓艺孙与陈独秀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邓艺孙的女婿葛温中，次子邓仲纯，三子邓以璽曾与陈独秀同在日本留学。邓艺孙的四子邓季宜则曾与陈延年、陈承年同在法国留学。邓艺孙与陈独秀年龄相差24岁，能成为忘年交，除了同为书香门第，又是同乡、亲戚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性格相近。

1905年，邓艺孙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共事。安徽公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呢？看看教员就知道了：除了陈独秀，还有黄兴、赵声、刘师培、柏文蔚、孙毓筠、苏曼殊、陶成章、谢无量等。可以说，就差将“革命党”三个大字写在学校大门上了。虽说当时大清快亡了，但还没死透呢，怎么会不管？事实上，作为学校校董的邓艺孙，利用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积累的名望，在保护学校师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该校创始人李兆熙也说“赖公维护保全”。

类似的保护，也出现在安庆。离开安徽公学后，邓艺孙曾在安庆担任安徽初级师范学堂斋务长兼经学教员。由于该校斋监夏君曾徐锡麟烈士是同乡，引起巡抚李家宝的怀疑，对学校虎视眈眈，邓艺孙又出来奔走疏解，使学校转危为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安徽省城无主，士民惊惶。邓艺孙为维持时局，倡议请孙毓筠回皖任督军，并亲往迎接。事定，邓艺孙被推任教育司司长。

山房之外家风何以常在有？

邓稼先为何远离身在北平的父母到江津读书呢？这就必须说到少年邓稼先的爱国心了。在日寇占据的北平城里，鬼子经常会强迫当地市民和学生集会游行“庆祝”日军在战场上的胜利。1940年，在一次“庆祝”中，邓稼先难以压制胸中怒火，将日寇的旗子得粉粉碎扔在脚下，狠狠地踩了又踩。此举无疑招来了杀身之祸的风险，以至于16岁的他不得不远离父母。

在邓稼先离开家的前夜，父亲邓以璽对即将远行的游子叮嘱道：“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父亲坐在《完白山人放鹤图》下的那张老式木椅上讲出这句话时的画面，几乎烙在邓稼先的脑海里。

邓以璽，1892年1月9日出生在铁砚山房，著名书法家，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白北”之誉。

和邓石如艺术上的卓越一样，邓以璽在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颇著南誉述。邓以璽对家风传承的发扬，也不亚于邓石如的“加倍赋能”，尤其体现在将旧文人道德观念与新学者进步思想的融合上。



铁砚山房内展示的邓稼先亲笔写的党员登记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摄

1985年秋冬，原核工业部九院（以下简称“九院”）进行党员登记。此时距离8月10日邓稼先做直肠癌切除手术、大约只有两个月。组织上考虑到邓稼先的身体情况，特意告诉他，文件不用学习，填表可以让别人代笔。邓稼先不同意。

邓稼先当然不会同意。在病情稍有缓解之后，他就把医院当成了办公室。

接到学习要求后，他从司机老任同志处借了一套文件，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之后，在1985年11月1日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他写的整表收获，有一千多字。他写道：“回顾农村体制改革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我国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我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实是有远见的和有科学根据的，是发展了马列主义。”“虽身患癌症，而矢志不移。”“九院”党委同志们收到这份登记表后，忍不住热泪盈眶。

除了这张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情感的党员登记表，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还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手迹。

一份是他在1986年3月28日在301医院南楼五病房16室，审阅经与专家研讨起草的向中央建议书后，写给胡患得同志的便函。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FEL，Excimer，电磁轨道等）高科技’（现在国内新用的专门名词）联系起来，申述一段，然后由我和老于签名，抬头是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抄九院）。”落款为“老邓”。

便函里提到“星球大战”，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研制的一个反弹道导弹军事战略；计划“FEL”是自由电子激光的英文缩写；“Excimer”指准分子激光；“老于”指中科院院士于敏。

什么样的建议书，需要“老邓”和“老于”一起署名呢？邓稼先逝世10年之后，中科院院士于敏、“九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书和时任“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得贵，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纪念邓稼先院士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

于敏等三位院士写道：“已身患重病的邓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了，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作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

“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为此，邓稼先客观地分析了各国技术发展和军控谈判的动态，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美国存在差距，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列出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建议书上报之后，立即得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的赞同，并及时采取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还有一份重要手迹，是邓稼先的绝笔。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邓稼先非常重视党和人民授予的荣誉，不顾身患病情危重，忍着剧烈的疼痛，亲手起草在接受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仪式上的发言稿。他握笔的手已颤抖不止，然而却清晰写出“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文物自介书”特别报道

